

# 明清至民国时期任丘鄭州鎮庙会变迁初探<sup>[1]</sup>

卢忠民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州鎮庙会兴起于明万历年间,清康乾时期达鼎盛,近代以后总势趋衰。前近代鄭州庙会的酬神、娱乐、商贸功能并重;近代以后各功能皆有所弱化。该镇庙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晚清、民国政府对鄭州大庙、庙会政策与明、前清时期相比骤变,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庙会变迁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明清至民国时期;鄭州鎮;庙会

庙会,是定期集市之外乡村的另一市场交易渠道。华北各地,自古多庙会,冀中亦然。鄭州鎮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河北名镇之一,关于其商业状况华北民间曾有“天津水全,北京人全,济南神全,鄭州货全”,“天下大庙数鄭州”<sup>[2]</sup>之谚。不过因资料匮乏,对该镇的研究较少,笔者所见只有李增琦《鄭州鎮商业市场的变迁》<sup>[3]</sup>一文对该镇的市场进行了简略回顾。此镇既因非国家税关之所,无税档可查;亦因建制较低,当地方志多语焉不详。鉴于此,笔者于2004年3-11月曾多次走访鄭州鎮,进行了社会调查,积极搜求民间珍藏资料以扩大史料范围。任丘市马合意先生提供了其收藏多年的《任邱乡土地理》手抄本一份、光绪《重修药王庙碑记》碑帖一份、《任丘文史资料》编委王传玉先生提供的清代前期《鄭州鎮平面图》一份,同时笔者还查到一些关涉该镇庙会的珍贵档案资料。本文主要利用这些资料,并参考《任丘市志》及其他文献,通过解剖典型、计量分析的方法,拟对明清至民国时期鄭州鎮庙会的变迁作一探讨,这不仅对研究庙会、市镇的变迁具有理论借鉴作用,且对探寻此等城镇及庙会之复兴具有现实意义。不妥之处,恳望批评指正。

## 一、鄭州鎮概况

鄭州鎮位于冀中平原中部,为畿南重镇,在河北任丘县城北40里,靠京德古御路,在京津保三角地带的当间。往西七里是白洋淀,水产丰富,经白洋淀可逆行入府河至保定;北十余里是大清河,可通天津;沿京德御路北上可抵北京,南下可达德州、南京,水陆交通方便。

鄭州鎮历史悠久,曾为诸侯国都、州城、县城、驿铺、镇。据光绪《大清一统志》载:“鄭县故城:在任邱县北,本赵邑。……汉置县属涿郡,……后汉改属河间,晋魏至隋因之。唐景云始于县置鄭州,开元十三年以鄭与郑(鄭)相类,改为莫字。……金贞祐二年改置莫亭县。元时莫亭县又为莫州治。明初州县治废,置鄭城驿于此。”<sup>[4]</sup>清承明制,鄭州鎮属直隶河间府任丘县辖,康乾时期该镇“民居繁盛,商贾辐辏”<sup>[5]</sup>。民国初期,鄭州鎮隶属于直隶津海道任丘县,1928年后属河北省任丘县辖。

鄭州鎮异于冀中其它集镇的典型特点有二:一是此镇在明以前多为该地的县、州城,政治、军事地位突出,尽管明以后废州县治所

沦为镇,但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地位总高于县城任丘,并总以城看待。二是该镇药王庙(扁鹊祠)系明万历帝御敕重修并钦设庙会,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庙会 is 郑州镇市场的支柱。

## 二、郑州庙会之结构与交易

从层次等级上说,徐浩认为,庙会“属于农村初级市场中心地的补充部分。与主要联系区域市场的市镇相比,庙会主要以服务本地为宗旨,大宗商品的集散功能较弱”<sup>[6]</sup>,此观点有一定合理之处,但对于具有强大商品集散功能的郑州庙会来讲则不适合,这从以下分析中可以看出。

### (一)庙会的期限

任丘“城关以及各镇堡,每岁皆有庙会一二次”<sup>[7]</sup>,其中郑州“每年四月大会,各省商贾云集”<sup>[8]</sup>,客商从来到走持续“大约近三个月的时间”<sup>[9]</sup>,对本地、冀中地区的影响最大。下面通过表1来透视一下郑州药王庙会期的变迁轨迹。

表1:明清至民国时期郑州药王庙会期统计表(农历)

时期	明清至民国初期	“七七”事变前
庙期	4月全月	4月15-25日
合计(天)	30	11
百分比	100	36.7

资料来源:乾隆《任邱县志》、民国《任邱乡土地理》、李增琦:《郑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从持续时间上看,上表显示,明清至民国初期,郑州庙期持续共30天,“七七”事变前11天,“七七”事变前仅为明清时期的36.7%,所以该镇庙期递减。一般来讲,庙会持续时间越长,其交易量越大,交易范围也越广,庙会规模也就越大。因此,郑州镇庙期的递减使得庙会规模渐小,从而说明该镇庙会呈衰势。

### (二)庙会的贸易范围、规模

明中后期,郑州庙会的贸易范围遍及北方大部分省区,如“河淮以北,秦晋以东,宣大蓟辽诸边,各方商贾辇运珍异,并布帛菽粟之属,入城为市。”<sup>[10]</sup>清康熙时期,郑州庙会贸易范围遍及全国,如“川、广、云、贵的珍贵药材,湖广的刺绣,江浙的绸缎,浏阳的夏布,四川的油漆,湖笔、徽墨及江南的土特产、竹器凉货、皮毛毡毯,东北的人参、鹿茸,内蒙的哈啦尼绒等”<sup>[11]</sup>皆在此上市。及至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因战争频仍,交通时有断阻,远方诸省商贾多不会冒生命危险来郑州交易,所以郑州庙会的贸易范围较之明清大大减缩。

郑州庙会康熙年间最盛,时郑州城内有三街六市<sup>[12]</sup>,城西一里许是赛马场,西北角是大型骡马市,城北则是群艺聚集之处,直至北大庙,庙会期间总是人山人海。<sup>[13]</sup>大街上“货物招牌林立、横幅凌空。各种商品堆积如山。零售批发,随处成交。连京(师)……巨贾,也到郑州庙会进货,当时从郑州街到大庙五里之内,商业布蓬搭成街道”<sup>[14]</sup>,“芦棚不见天日”。<sup>[15]</sup>据此推断一下郑州庙会的交易规模。郑州城到药王庙5里内皆为临时店铺(系芦苇搭就的棚子),按每隔3米<sup>[16]</sup>一店计,共有商铺833个,由于路两边皆是临时店铺,所以共计1666个。因大庙东西宽约450米<sup>[17]</sup>,按上面的推算方法,庙前临时铺店计有300个,这可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大火使“商贾所处,连簷数百间,一时俱烬”<sup>[18]</sup>得到印证。此外,还要加上郑州城内的行商座贾。城内三街六市,中间为中和街,长约3里,兴隆街、广益街稍短,各长约1里,三街共计5里,由于“临街两侧均为店铺”<sup>[19]</sup>,如按上面的算法,城内共有商摊1666个。另《任丘市志》云,城内规模宏大的固定商店有绸缎庄数十家(暂按50家计),钱粮庄10余家(暂以10家计),较大饭庄10余家(暂以10家计),中小商店难以统计<sup>[20]</sup>(暂按100家计),共170家,这样城内座贾行商

共计1 826家。又骡马市的交易额较大,赛马场、百艺市属娱乐之所,人定颇多,亦当有诸多商摊买卖供游乐民众之需,然其商贾数目无法计算,此暂不计入统计总数,所以康熙时郑州庙会的座贾行商最保守的数字估计也不下3 792家。虽无法计算当时具体的交易额,但由近3 800家的商贾数也能窥见一斑。

民国时期,郑州庙会交易规模逐渐缩小。时郑州民困无处筹钱,以至“重修庙宇不及,街衢以客货无著,遂改移郑州街内”,因而“商贾交易,届时皆鳞集于郑州。”<sup>[21]</sup>这表明,当时不仅郑州至大庙沿路两旁已无临时商铺,且因庙破庙前亦无商摊,所有交易皆集于郑州城内,鉴于城内交易空间有限,所以交易规模定较康熙时期大大缩小。这从各时期郑州坐商户数的变化情况(见表2)可看出。

表2:郑州各时期坐商户数对照表

时 期	坐商(户)	指 数 (事变前为100)
康熙年间	至少 170	116
道光二十四年(1844)	17	12
事变前几年	147	100

资料来源:康熙年间资料参见上面的推算、《任丘市志》、任丘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1-40。

上表显示,就郑州镇各时期坐商指数而言,康熙时最高,道光时最低,前者是后者的9倍强,事变前亦较康熙时降了至少16%。其发展趋势时减时增,但与康熙时相比,总势趋衰。

要之,明清至民国时期郑州庙会无论会期、贸易范围,还是市场规模,与康熙时相比皆呈衰势,这也相应引起庙会功能的变迁。

### 三、郑州镇庙会之功能

庙会是集酬神、娱乐、商贸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民间盛会。寺庙本是宗教活动之所,所以庙会最初主要用于娱神,来者主要是香客、祈祷还愿者,后来借着寺庙这种特

殊场所,进行休息、娱乐,进而进行交易,许多寺庙所具有的文化娱乐与商业功能遂由此而生,以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与调剂余缺等贸易需求,庙会作为集镇或市镇的补充,构成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华北各地庙会最盛之地首先是该庙之神最受崇拜、香火最盛之处,如药王庙等<sup>[22]</sup>。郑州庙会即属此类。郑州相传为战国名医扁鹊的故乡,自元朝在此修建扁鹊祠而渐显名。<sup>[23]</sup>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钦命每年四月为郑州庙会,会期一个月<sup>[24]</sup>,逐渐成为跨省区性的大规模交易市场。<sup>[25]</sup>并成为全国众多的庙会中最为旺盛的庙会。<sup>[26]</sup>下面具体审视一下其功能之变迁。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禁止郑州庙会以前,庙会酬神、娱乐、商贸功能并重。此时郑州庙会娱神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全民性、反规范性的特征<sup>[27]</sup>,如明万历年间,“起庙第一天,大太监魏忠贤陪伴皇太后和皇姑前来降香”<sup>[28]</sup>,每年四月初,北方大部分省区的富商、“京师……贵大侠,以及名娼丽竖,车载马驰,云贺药王生日”,会场上“幕帘遍野,声乐震天”<sup>[29]</sup>,“香火繁盛,为畿南冠”<sup>[30]</sup>;清康乾时期更是“诸货鳞集,祈福报赛者接踵摩肩。”<sup>[31]</sup>这说明不同阶层、等级及不同职业、性别、民族、地域的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前来赶会,尽管他们上会的目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皇亲及各级官员也常以私人身份参与其中,而这在传统的官本位社会中又反过来引起群众的更大兴趣。当然,参加庙会娱神活动的主体仍然是平民百姓。所以庙会及娱神活动具有全民性特征,体现为参加者不分贵贱及男女混杂。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参加公众活动的诸多限制,这一点就更有意义<sup>[32]</sup>。由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闲暇时间比较单调乏味,各种庙会活动便给他们创造了集中放松、尽情欢娱的机会<sup>[33]</sup>,庙会形成

了闲暇生活的多元结点<sup>[34]</sup>。然庙会吸引商人的却不是文娱,而是为文娱所吸引的人群,它把更大范围的购买力聚拢起来,使商人成市有利可图<sup>[35]</sup>,故而庙会期间交易规模宏大,郑州庙会处鼎盛时期。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禁止郑州庙会以后,庙会酬神、娱乐、商贸功能皆弱化。道光十四年(1834年),道光帝下令禁止郑州庙会,遂“后以进香作会为有司严禁,景物消歇,不似从前云集矣。”<sup>[36]</sup>这说明此时不仅庙会的娱神、娱人功能受重击,开始弱化,而且其商贸功能也开始弱化,如道光二十四年县城有商户46家,郑州有商户17家。<sup>[37]</sup>说明当时郑州在经商户数方面已被任丘超过,郑州庙会受重创。由于庙会文化本身具有稳定性、顺延性,不可能因一道圣旨而烟消云散,此后,郑州庙会各功能逐渐恢复,如光绪年间“四月三旬之会,十八省商贾云屯,盛莫如之”<sup>[38]</sup>;民国初“歌舞兴盛”<sup>[39]</sup>，“七七”事变前几年“人烟稠密,香火隆盛”<sup>[40]</sup>,为“极大会场,又为习武术之中心地,技击之士,趋之若鹜。”<sup>[41]</sup>尽管如此,但郑州庙会诸功能较之康熙时期已有所弱化,如民国以后布业被高阳夺去,木材及木器也改移白沟河订货,大客店无人住,镖行取消,赛马会不再举行,从此,郑州的繁盛一去不返<sup>[42]</sup>,改变了“平津其实听郑州的行市”<sup>[43]</sup>的辉煌时代。这可从郑州市场分类(见表3)方面窥见一斑。

表3:郑州镇各时期专业市场分类统计表

时期	康熙年间	清末至七七事变前
市场名称	布线市	粮市
	骡马市	布市
	药材市	骡马市
	南货市	药市
	珠宝市	夏货市
	百艺市	皮货市
		山货市
合计	共6市	共7市

资料来源:郑州大庙平面图。李增琦:《郑州镇

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245页。

注:(1)各市只限于郑州城的情况,未包括郑州城至药王庙沿路庙会商贸市场情况。

上表显示,郑州庙会各时期皆有布线、牲口(骡马等)和药材市,说明该镇庙会或集市有满足地方性生活、生产需求之功能。康熙时郑州共有6个专业市场,除上述各时期共有的三市场外,还有珠宝、南货(南方诸省运来的商品,北方没有)二市属高、中档消费品市场,用以满足富贵之家较高层次及农民婚丧嫁娶、年节等消费需求,省际商品集散功能较强。此外亦有娱乐消遣专业市场——百艺市(如唱戏等),这说明庙会的商贸、酬神、娱乐功能均较强。清末至民国前期共有7个专业市场,较之康熙时增加了粮食市,且以“粮市,牲口市并盛”<sup>[44]</sup>,说明郑州市场分类越来越细,地方性功能增强。其间虽也有较高、中档商品,如皮货、山货、夏货(系康熙时南货市场的一部分)市等,不过,因这时比康熙时少了交易额巨大的珠宝市,说明此时庙会的跨省区性商品集散功能有所减弱,尤其是集散特贵重商品的功能有所弱化。同时庙会期间尽管也有娱乐演出,如昆腔、龙灯、高跷等<sup>[45]</sup>,但随着娱乐专业市场(百艺市)的消失,庙会使人借以倾心消遣娱乐的功能也当有所减弱。但娱乐、商贸功能弱化幅度并不大。

总之,前近代郑州镇庙会的酬神、娱乐、商贸功能并重。近代以后各功能皆有所弱化,但直至“七七”事变前,弱化幅度不大。

#### 四、郑州庙会变迁之原因

明清至民国时期郑州镇庙会变迁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晚清政府对郑州大庙、庙会政策骤变

庙会之兴衰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即

国家一旦采取宽松的政策,庙会便会在一定限度内得到发展,反之则否。晚清政府对郑州大庙、庙会的政策与明、前清相比形成强烈反差。

明、前清两朝政府大多鼓励扶植庙会,这是郑州庙会得以勃兴的政治基础。这首先从是否愿投资修缮药王庙方面可见一斑,如明万历帝“大出内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农、轩辕三皇之殿”<sup>[46]</sup>,并钦设郑州庙会,敕令全国各地较大商号咸来郑州赶会,“自是药王之会,弥加辐辏”。<sup>[47]</sup>此外,万历帝对庙会的倾斜政策有碑文为证,现摘之如下:<sup>[48]</sup>

《御制重修郑州药王庙碑》云:“……郑州药王庙者,相传为扁鹊庙,其来若干年。……而基址痹狭,椽栋颓落,像设弗严,蒿裸无所,……朕乃顺民所欲,出供奉羨金,新而广之。”

又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庙毁于火<sup>[49]</sup>,之后,乾隆发帑银重建。<sup>[50]</sup>由于皇帝出资修缮,方使郑州药王庙“人烟辐辏,遭回禄而庙貌屡新。”<sup>[51]</sup>可见,政府的支持是保证郑州大庙完整、庙会正常进行的根本条件。

然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四年(1834年)郑州大庙“连毁于火”,<sup>[52]</sup>此时御史刘谊奏请严禁越境烧香,否则“即将为首之人严拿究办。”<sup>[53]</sup>随后,郑州庙会被取消,尽管后来又恢复了,但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盛况。<sup>[54]</sup>可见,道光帝与明万历、清康熙、乾隆三帝在对待郑州大庙及庙会的政策上截然不同,一出资修缮,钦立庙会;一不但不修,反而严禁庙会,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使郑州庙会继续盛昌,后者使庙会开始趋衰。前后政策的巨变,是郑州庙会变迁的根本原因。

## (二)清末民国时期郑州镇交通不畅

交通对于庙会的兴衰至关重要。交通方便之地的庙会易于输入输出远近货品,方便商民交易,庙会因之而兴,反之则衰。如河南赊旗、朱仙二镇皆因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而

衰落<sup>[55]</sup>。清末民国时期郑州镇也因交通不畅,严重影响了该镇庙会的发展。明清时期,郑州镇“居九河之险,通八省之衢”。<sup>[56]</sup>然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赵王河改道,自郑州以北十方院接承白洋淀之水,直通天津,已不再经过郑州<sup>[57]</sup>,且京德古御路衰败<sup>[58]</sup>及津保(南线)公路的兴盛,使任丘在交通方面超过郑州,此时白洋淀周围的物产多经任丘运往天津、保定等地<sup>[59]</sup>,而不再到郑州集散,郑州庙会倍受影响。此外,郑州“在平汉、津浦两铁路未修建以前,该镇是南北必经的要道,商品集散之所。每年四月大庙会,远距数千里的商人都赶来交易。”<sup>[60]</sup>清末京汉、津浦铁路建成后,北京与外省的交通、物资联络,西经保定、石家庄南下,东由天津南下和东去,都不再经过郑州。又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华北特别是直隶的贸易中心”,<sup>[61]</sup>人们多移视线于京、津等大城市,原来由郑州集散的大批物资多到天津集散外销或输入外洋商品<sup>[62]</sup>。

总之,清末民国时期郑州镇因交通不畅,使其庙会受极大冲击:一是人们多不愿到交通不便之地贸易,致输入输出货品减少;二是随着城市近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们多把目光投向京、津等大城市,郑州庙会因此随之式微。

此外,清末民国时期冀中商业集镇勃兴,随着郑州周围集镇的增长、壮大,竞争对手日增,吸引各镇附近农民就近贸易而不必再绕远去郑州,于是彼兴而此衰,这也是郑州镇庙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再者战争对该镇也有极大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此处暂不详述。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明清至民国时期郑州镇庙会随时事变异而有变迁,时兴时衰,时有反复,但与明清时期相比,总势趋衰。同时郑州镇随庙会之设、兴而兴,亦随庙会之停、衰而衰。

前近代郑州镇庙会的酬神、娱乐、商贸功能并重;近代以后各功能皆有所弱化,但直至“七七”事变前,弱化幅度不大。明清至民国时期郑州镇庙会变迁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晚清、民国政府对郑州镇大庙、庙会政策与明、前清时期相比骤变,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庙会变迁的显著特点。而近代郑州镇交通不畅及冀中商业集镇勃兴则是其庙会趋衰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冀中及全国许多集镇、庙会变迁的重要原因。

(附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河北大学李金铮教授给予悉心指导,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先生提出建设性意见,任丘市图书馆马合意先生、《任丘文史资料》编委王传玉先生分别提供了其收藏多年的珍贵资料,方使最后成文,特此致谢。)

#### 注释:

[1] 清雍正二年(1724),为避孔子讳,将“任丘”县改为“任邱”县。直至1981年全县地名普查时“任邱”改为“任丘”。为行文便,凡涉及“任邱”(引文除外),皆称“任丘”。河北在1928年以前称直隶,为行文便,凡涉及“直隶”(引文除外),皆称“河北”。当地人一提郑(音 mào)州镇庙会,如无特别说明皆指“药王庙”庙会。本文仅研究七七事变以前的郑州镇庙会变迁情况。

[2] [3] 李增琦:《郑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4] 光绪《大清一统志》卷十五《河间府一·古迹》,光绪28年,上海宝善斋石印。

[5] 光绪《大清一统志》卷十六《河间府二·关隘》。

[6] 徐浩:《清代华北的农村市场》,《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4期。

[7]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五,刘崑源手抄本,任丘市马合意藏。

[8] [21] [40] 民国《任邱乡土地理》,庙会一。

[9] 王英才等:《郑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第96页。

[10]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外郡·郑州》,中华书局,1959年,第616页。

[11] [14] [20] [24] 孙杰主编:《任丘市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5页。

[12] 即中和街、广益街、兴隆街;布线市、百艺市、骡马市、南货市、珠宝市、药材市。见郑州城及郑州大庙平面图,任丘市王传玉藏。

[13] 姜吉恒等:《郑州史话》,《河北文史资料》第21辑,1987年,第190页。

[15] [清]高士奇:《南行扈行录》,转引自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445页。

[16] 因当时“每日盖搭蓬厂,尺寸地非千钱不能得”(〔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外郡·郑州》,第616页。),地皮昂贵,商多而市场区域有限,所以各商贾租用的临时店面间隔不过二、三米,按间隔3米一店计,在当时应算得上大铺面。此系张恩惠老人2004年3月5日上午口述。张恩惠,郑州镇古州村人,69岁,现郑州大庙工作人员。

[17] 王英才等:《郑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第90页。

[18] [36] [49] [52] 道光《任邱续志》卷下《绪言志·余录》。

[19] 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614页。

[22] [33] 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5期。

[23] [25] 严兰绅主编,张岗著:《河北通史》(明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26]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编写组编:《河北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6页。

[27] [32]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28] 姜吉恒等:《郑州史话》,《河北文史资料》第21辑,第193页。

[29] [46] [47]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外郡·郑州》,第616页。

[30]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兵部·武庙》,第867页。

[31] 乾隆《任邱县志》卷二《建置·坛壝》。

[34] 朱小田:《传统庙会与乡土江南之闲暇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5] 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37]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414页。
- [38][51]光绪《重修药王庙碑记》,光绪16年拓本,任丘市图书馆马合意藏。
- [39][42][44][57][62]李增琦:《郑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第246页。
- [41][45]王绍年:《各县调查》,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编:《河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三年二月。
- [43]《任邱县城镇半年来工商业变化情况总结》,1949年8月27日,任丘市档案馆档案:1-1-40。
- [48]王英才等:《郑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第104~110页。
- [50]王英才等:《郑州述古》,《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第94页。
- [53]光绪《畿辅通志》第一册,卷五《帝制纪·诏谕五》,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3页。
- [54]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445页。
- [55]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王兴亚:《清代河南集市贸易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2期。
- [56]李秉哲、纪天翔:《六座古城》,《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第115页。
- [58]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293页。
- [59]沧州地区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沧州地区公路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 [60]《任邱县城镇半年来工商业变化情况总结》,1949年8月27日,任丘市档案馆档案:1-1-40。
- [61]严兰绅主编,方尔庄著:《河北通史》(清朝下卷),第237页。

## Initial Exploration on Temple Fair Changes of the Maozhou Town in Renqiu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Minguo Period of China

Lu Zhong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Maozhou temple fair began to rise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Kangqian period in Qing Dynasty. With the modern age coming, the fair took on decline as a general tendency. Before modern age the functions of Maozhou temple fare, such as religious ceremonies, recreations and trades, were comparably important, but after that each function were all towards decline in a way. The changes of the Maozhou temple fair, the basic reason lay in the greatly change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Maozhou temple and the temple fair during the late Qing, compared with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which were evid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hanges of temple fairs in other counties of the middle area of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 Maozhou Town, Temple Fair, Change

[作者简介]卢忠民(1973—),男,河北东光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